

# 刘咸炘韩愈研究述略\*

陈开林,魏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韩愈作为诗文名家,向为论文者所关注。刘咸炘所著《订韩》,评议韩愈其人其书,颇多精义。然而该书因未刊而隐晦不彰,迄今未引起学界关注。随着《推十书》的刊布,其学术价值有待深入研讨。文章介绍了《订韩》撰写的原因及体例,并结合刘咸炘的具体论述,从韩愈行谊的评判、韩愈诗文的平议两个方面进行了总结。行谊表现为崇儒排佛,徒有其表;干谒请乞,败坏儒风;持论不公,撰述失实。诗文则包含诗作品鉴和诗文定目两个方面。

**关键词:**刘咸炘;《订韩》;韩愈;《推十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5)05-0083-06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号宥斋,四川双流人。民国著名学者。一生笔耕不辍,勤于著述,虽享寿不用,却成果丰硕,总计著书235部,475卷,名为《推十书》。刘咸炘学贯四部,对文学素有积蕴,颇多灼见。新近整理出版的《推十书》戊辑四册除其自身创作的文学作品外,另有他的文学研究专著多部,如《文学述林》《文式》《文说林》《文心雕龙阐说》《诵〈文选〉记》等,研治范围极广。对于韩愈,刘咸炘亦素有研讨。

韩愈(768—824)作为中唐时代杰出的文学家,散文和诗歌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文人,由于多种原因的交互作用,往往成为后世聚讼的焦点。后人对韩愈其人其文的评价,因时代、评论者而异,其地位起伏极为显著。刘咸炘所作《订韩》,由于生前未曾刊行,不为学界所知。虽然篇幅不多,但极富价

值,值得探究。本文拟对该书略作论述,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的研究。

## 一、《订韩》撰写的原因及体例

《订韩》一篇,今收入《推十书》丙辑第四册,为未刊稿。题后注“己未二月”、题下一行注“此书成稿甚早,尚须删简,又有引前人说未钞全者”<sup>[1]1403</sup>。故今本《订韩》似为作者未竟之稿,且文中尚有二处残缺。“魏鹤山《韩愈不如孟子论》”条<sup>[1]1405</sup>、“史称愈明锐不诡随”条<sup>[1]1408</sup>,条后均有整理者按语:“以下有空页。”

刘咸炘注明《订韩》成书时间为“己未二月”,即公历1919年2月,成书年代甚早。然而在后人研究的韩愈论著中,《订韩》一直被忽略,故而其学术价值未能彰显。吴文治先生编《韩愈资料汇编》,凡四册,在《凡例》中指出“本书辑录从中唐至‘五四’一

\* [收稿日期]2015-02-03

[作者简介]陈开林(1985—),男,湖北麻城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古典文献学研究。

魏敏(1990—),女,湖北应城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生,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近代学术研究。

千一百余年间有代表性的评述五百三十余家<sup>[21]</sup>”,其后汕头大学中文系所编《韩愈研究资料汇编》中,收有张惠民先生的《1911—1948年间韩愈研究综述》<sup>[3]166-178</sup>,论列颇详,然均未载录刘咸炘《订韩》的内容。《韩愈集》的相关评注本亦未参考刘咸炘的成果。究其原因,恐为《订韩》未刊的缘故。

关于《订韩》写作的原因,《订韩叙》中有明确的交代。《叙》开篇提出:

唐吏部侍郎文公韩子退之,后世所称道德文章之宗也,从祀于孔子之庙。读书者莫不读其文学者,数三代以下魁儒,指不十屈必及焉。……咸炘读退之之书,窃尝有不愜于心,详而察之,然后知其多不虞之誉。<sup>[1]1403</sup>

韩愈在后世的地位,自其弟子大肆推尊,及至苏轼倡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sup>[4]3113</sup>之后,颇为尊崇。然结合具体事实,不难发现其中多有意气之辞,非公允之论。对此,刘咸炘有所指责。他认为:“李翱《行状》、皇甫湜《墓志》《神道碑》,其推退之之文,皆师弟之私。宋子京亦尊韩者,故撰《新书》本传,亦极推之,皆不可信也”<sup>[1]1439</sup>,对韩愈弟子、史书之记载表示怀疑。

尽管韩愈在后世有着极高的地位,但是对其诋毁污蔑之词亦不少见。要合乎知人论世之道,不仅要对其“不虞之誉”予以澄清,也要对其“求全之毁”予以辨正。刘咸炘指出:“近百年来汉学兴盛,言理则鄙程朱,言文则薄唐宋,其于韩子又不无过毁”<sup>[1]1403</sup>,因此,客观公正的态度,即是要做到二者兼顾,方能做到意气平和,不偏不倚。职此之故,刘咸炘在文尾总结道:

佐佑六经,粹然一出于正(《新书》);扶经之心,执圣之权,精能之至,出神入天(《行状》),何其言之易也!至于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刊落陈言,横鹜别驱,汪洋大肆(《新书》);鲸鉴春丽,惊耀天下,然而密粟窈眇,章妥句适(《行状》),则庶几乎!(按:括号内字原为小字。括号乃笔者所加)<sup>[1]1439</sup>

对于李翱《正议大夫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韩文公神道碑》、宋祁《新唐书·韩愈传》等文对于韩愈的评价,

刘咸炘是用公允的立场予以取舍的。一方面,对于过度地拔高韩愈的形象,夸大其影响的评论,他觉得“言之太易”,认为不太可信;另一方面,对于韩愈捍卫儒学、改良文风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鉴于“积习生常,过枉害直,纵毁誉而乱是非之真”的状况,刘咸炘力持客观的态度,因而“钩考遗书,采集众议,录为一篇”,对韩愈其人其文进行了评价。不过《订韩》内容主要是“多举其瑕而略其瑜”,目的在于“以定韩子之真”。他进而解释“订”的意思为“评议”<sup>[1]1403</sup>,当是从许慎《说文解字》之本义。这就说明他并非是“喜为掎击”,专为攻韩愈之恶,而是经过寻讨之后,深有洞见之举。

关于《订韩》的体例,主要是采用札记的形式,加以点评。这也是刘咸炘著述一贯的风格。如他所著的《文心雕龙阐说》《诵〈文选〉记》《吕氏春秋发微》《文史通义识语》等,均为此一形式写成。就内容而言,《订韩》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评判韩愈的行谊和平议韩愈的诗文。下文将结合具体文字,从这二个方面进行论述。

## 二、韩愈行谊的评判

行谊,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有两层含义:一是品行、道义;二是事迹、行为。<sup>[5]919</sup>韩愈的品行、行为在后世争议较大,用行谊一词较为切合。后人关于韩愈行谊的评价,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其崇儒排佛之矛盾;二是其干谒之无耻;三是其撰述内容之失实。对此,刘咸炘均有评判。评判的方法,或独抒己见,或先征引前人文字,间下己意,或驳或赞。兹条列于下:

(1)崇儒排佛,徒有其表。历代学者对韩愈崇儒排佛的议论文字极多,聚讼纷纭。学者所持有的态度大体可以归为三类:肯定排佛的积极意义;从韩愈言行不一否定其排佛;韩愈对佛学有取舍。<sup>[2]1-2</sup>导致意见分歧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韩愈与僧徒的交往。一方面,韩愈以儒学继承者自居,极力捍卫道统,排斥佛法,撰写了《原道》《论佛骨表》等文章,且险因辟佛而丧命。同时,他又与僧徒频繁往来,甚或对其人称羨不已。这一矛盾的事实集中在韩愈一人身上,颇为费解。对韩愈的道统问题,刘咸炘认为:

韩愈自命接孟子之传,屡见于言。然孟子大本领,韩子全不知。孟子言性善,而退之言性有三品。孟子辟杨墨,退之知之,而《读墨子》则谓“孔、墨必相为用”,是其大旨已乖。况治经非有发明,不如汉儒;学道未窥精微,未及宋儒。其于从祀之例,无一当者,徒以辟佛老耳,徒以宋人称之耳。纵宽取之,亦岂应如是之空溢耶?<sup>[1]1405</sup>

韩愈在《原道》中指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sup>[4]2665</sup>,揭橥道统的传承,隐然以道统自命。后世的儒学道统论亦将韩愈纳入传承的谱系之中。刘咸炘从韩愈“接孟子之传”入手,对比了二人之间的区别,论定韩愈与孟子差异较大。下文征引了郑少微之说,指出“孟、韩之功其同二,而立言行己其异五”<sup>[1]1405</sup>。更何况韩愈“治经非有发明”、“学道未窥精微”,就道统而言,配享孔庙,实为名不副实。

至于辟佛之举,刘咸炘首先指出“辟佛老之误,亦非一言所能辨”,并说其祖刘沅(1768—1855)“《正讹》已取《原道》而详驳之矣”<sup>[1]1403</sup>。继而征引清人包世臣《书韩文后》,对“退之以辟二氏自任,史氏及后儒推崇皆以此”<sup>[1]1403</sup>的现象进行了驳斥,并进一步指出“退之与大颠游,盖亦惑于禅家之说”<sup>[1]1404</sup>。

对于韩愈的道统地位及辟佛行为,主流观点均予以肯定。如《新唐书》本传所云“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sup>[6]5269</sup>。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先生发表《论韩愈》,指出韩愈的六大功绩,其中就有“建立道统”“排斥佛老”“呵诋释迦”<sup>[7]319-332</sup>。汤用彤先生亦称“文公一生,志与佛法为敌,尝以孟子辟杨墨自比”<sup>[8]26</sup>,并论历朝辟佛诸人“用功未有昌黎之勤,议论未若昌黎之酷烈”<sup>[8]27</sup>。而刘咸炘对韩愈此举,基本持否定态度。当然,刘咸炘并未就此而彻底否定韩愈其人。他一则备录程子(程颢,1032—1085)之说,认为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再则引王安石之诗“可怜无补费精神”,甚为韩愈惋惜。对于“予夺乃大有不同”的矛盾,刘咸炘折衷以己意,认为韩愈“其言常详于外而略于内,其志常极于远大而其行未必能谨于细微”<sup>[1]1404</sup>,可谓一语中的。

(2)干谒请乞,败坏儒风。近人钱穆(1895—1990)称:“唐代士人干谒之风特盛。姚铉《唐文粹》至专闕《自荐书》两卷。”既此,唐代干谒之风可见一斑。钱穆更论“而韩昌黎《三上宰相书》,乃独为后世所知。”<sup>[9]87</sup>再翻检历代关于韩愈干谒之文的议论,和钱穆持论相同的不乏其人。在后世的印象里,韩愈此类文章颇遭非议。刘咸炘对韩愈的干谒文章亦颇有微词。他说:

读退之三上宰相、应举与人诸书,何其干乞之无耻也!乞之不能而继以愤怒,炫之不能而继以卑哀。上宰相则举周公以形人之丑,自言其穷饿;上于襄阳则乞刍米仆赁之资;应科目与人书则既摇尾乞怜焉而以为不,何其硁也!唐人多上书自荐,固不止退之一人。然退之固自俨然自谓接孟子之传,其于七篇之书,岂熟视而无睹邪,抑假以为重而言不顾行耶?<sup>[1]1405</sup>

韩愈干谒之文颇多。刘咸炘曾指出“《上兵部侍郎书》《上于襄阳书》《与凤翔邢尚书书》《应科目时与人书》《上贾滑州书》《上考功崔虞部书》,皆干进之词也”<sup>[1]1406</sup>。他首先标举“人生大事,莫过于出处”<sup>[1]1404</sup>,继而对韩愈《上宰相书》《上于襄阳》《应科目时与韦舍人书》等文逐一进行驳斥,并与李白、董仲舒作对比,深刻地鞭笞了韩愈的请乞行为。

关于唐代文人干谒行为,本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去妄作评判。钱穆稽考史实,认为当时“固不以此为卑鄙可羞”<sup>[9]95</sup>。刘咸炘对韩愈干谒的否定,表面上似乎是沿袭前人的态度,夷考其实,则不尽然。他说:

儒术之坏,由于游说干进,苟一蹈之,则不足以为儒。此固未可遍责之常人,而于退之不能不厚责焉,则以其持儒义以道自任,易为后世藉口也。后世方以韩、孟并称,苟不明此义,方将谓干进为儒事矣,可不辨哉。<sup>[1]1405-1406</sup>

寻绎文中所言,可见刘咸炘并非对韩愈过于苛责,而是有深层的思考和隐忧。干谒之风,不仅有关一人之得失,实则足以败坏儒术。“厚责”韩愈的原因,在于他“持儒义以道自任”的身份。刘咸炘的目的在维系儒术之业不坠,可谓用心良苦,切不可因

他表面的责斥而忽视了其背后的喻义。

(3) 持论不公, 撰述失实。韩愈一生历经代、德、顺、宪、穆、敬六朝, 时势动荡, 宦海浮沉。一生撰述, 多有内容不切事实之处。就其从仕途而言, 为谋求职位, 不得不行干谒之举, 故尔文中多“谀词”。如前举《上于襄阳书》, 刘咸炘就指出: “于頔之为人无足取, 其文亦何美? 而韩子上书乃以有言浑浑噩噩为颂, 几于谀矣。”<sup>[1]1406</sup> 此类文章, 前已具论。

第二类为“谀墓文”。《韩愈集》中碑铭之作, 颇涉谀墓之嫌。韩愈同时的刘又已经揭橥了这一事实, 说韩愈的润笔乃“谀墓中人所得耳”。<sup>[10]205</sup> 北宋司马光(1019—1086)也曾提到韩愈“好悦人以志铭而受其金”<sup>[1]1406</sup>。对司马光的观点, 刘咸炘表示支持。不过这一类文章, 往往是应人之请, 其内容多为外在的人情世态所决定。正如袁枚所言: “其人虽于世庸庸, 于我落落。而无奈其子孙欲展孝思, 大辇金币来求吾文, 则亦不得不且感且惭, 贬其道而为之”<sup>[11]331</sup>, 颇能道出个中缘由。接受了这样的委托, 在写作过程中也就难以免俗。对此, 无须苛责韩愈。

相较而言, 刘咸炘关注的是韩愈的第三类文章, 主要与政治书写有关。他说:

退之平生私见失言而乱是非且又玷大节者, 莫如《顺宗实录》与《永贞行》。吾读《实录》而大疑之。既读近儒书, 乃知已有先我发之者。<sup>[1]1408</sup>

为了支撑自己对《顺宗实录》的看法, 他笔录前人之说, “更为推求之”, 记有范仲淹、王应麟、阎若璩、何焯、全祖望、赵彦卫、刘克庄、江瀚、王鸣盛、王志坚、孙宜、张燧、贺贻孙、陈祖范、李详、魏了翁, 达十六人之多, 且多长篇征引。推究刘咸炘立论的依据, 集中于《顺宗实录》一书“失言而乱是非”。如韩愈所举逆党, 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泰、韩晔、陈諫、房启、凌稚、程异、刘禹锡、柳宗元等人, 皆精进之士; 而李实、俱文珍等奸邪之人, 韩愈则大书特书, 持论殊为不公。此外, 韩愈《上李实书》《送汀州监军俱文珍序》等文对其人大肆吹捧, 亦有党同之嫌。前举刘咸炘所言及《永贞行》一诗, 陈寅恪即评为“不过俱文珍私党之诬词, 非公允之论也”<sup>[12]308</sup>。不

过, 若纵观全书, 刘咸炘也承认该书“详书李实之恶及宫市、乳母、五坊小儿事, 书陆贽、阳城事, 皆可谓直笔”<sup>[1]1436</sup>, 并非对其一概否定。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 以及韩愈自身的政治主张, 则政治书写中的偏颇、失实也是可以理解的。韩愈本来是文人, 用“不虚美, 不隐恶”的良史标准来衡量他, 确实悬鹄太高。

### 三、韩愈诗文的平议

韩愈的诗文成就, 《旧唐书》称“自成一家新语”<sup>[13]4204</sup>、《新唐书》称“深深本元, 卓然树立, 成一家言”<sup>[6]5265</sup>, 其诗文创作的独特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文学地位经苏轼等倡呼, 文集经方崧卿、朱熹等考订, 道统又经宋儒等鼓吹, 其人其文的地位日益增加, 因此在宋代, 韩愈除了配享孔庙外, 甚至还出现了“五百家注韩”的盛况。

不过, 对韩愈诗文创作的评价也存有争议。他部分文章独异的风格、以文为诗的诗歌创作, 自古就招致了一些人的反对。如韩愈颇有特色的《毛颖传》, 今日看来实为千古奇文, 但在当时就遭到了张籍的否定, 认为“驳杂无实”<sup>[14]994</sup>。《旧唐书·韩愈传》也讥为“文章之甚纰缪者”<sup>[13]4205</sup>。至于作诗, 韩愈独辟蹊径, 趋奇尚险, 尽管开辟了一个新的诗歌世界, 不过流弊继起, 亦给后人以口实。因此, 誉之者欲其升天, 毁之者欲其入地。双方各执一词, 喋喋不休。

刘咸炘对韩愈诗文的平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结合具体的诗文, 用札记的形式予以评论; 二是分为三品, 定其高下。

(1) 韩愈诗文的品鉴。刘咸炘按照体裁将韩愈作品划分为赋、诗、文三个部分。韩愈赋, 今存《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别知赋》四篇, 故尔赋类评论文字较短, 而评诗、评文则较多。

刘咸炘评论的内容, 第一种为归类。如评文部分, 他将韩愈的碑铭按一些特质进行了整合, 归结为“简质合体者”, 计 19 篇; “用传记法者”, 计 12 篇; “少事迹而矜重者”, 计 25 篇; “有空衍议论而不尽矜重者”, 计 5 篇。评诗部分亦有将数首诗同时进行评论, 纠集其共性, 如“《东野失子》《落齿》《双鸟》《苦寒》诸篇刻酷而近于戏, 恶道也”<sup>[1]1424</sup>。

第二种为指陈得失。即落实到具体作品, 指出

该作品的妙处或不足。此类文字最多,亦最有价值。如:

联句诗真所谓“无补费精神”者也。《柏梁》已不足信,况又限之以韵,苦涩强凑,戏而不工,亦何取哉。<sup>[1]1424</sup>

《争臣论》义正矣而文亦善,其茂畅可置之魏、晋间。<sup>[1]1428</sup>

《送王含》文笔美而意无聊,乃以酒起兴。<sup>[1]1430</sup>

限于札记的体例,刘咸炘的评论往往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展开说明。但是,点评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故尔其只言片语即能切合文章的利弊,要言不烦,言必有中。

第三种为探溯诗文模仿之本源。班固《汉书·艺文志》谓诸子出于王官,推本九流之本始;钟嵘《诗品》,亦追溯诗人之所从出。这种推本溯源的做法,虽然略显牵强,不过由此可以明了学术传承、流变的谱系。刘咸炘精熟传统学术,故对诗文进行品鉴时,往往可以洞悉诗文模仿的痕迹,予以辨析。如:

《鄂州溪堂诗》之摹《三百篇》,尤其杰也。<sup>[1]1424</sup>

歌行短篇学太白,长篇学杜。<sup>[1]1425</sup>

论著诸篇,大抵学韩非耳。<sup>[1]1426</sup>

《东晋行状》力摹左史,是用意之作。<sup>[1]1436</sup>

通过对诗文模仿本源的探讨,一方面可以结合被模仿的作品,来进一步解读韩愈的仿作,加深了解韩愈诗文的风格;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韩愈诗文的模仿对象,来体察韩愈的知识结构。这项工作需要品鉴者具备丰富的知识,同时对韩愈作品有较深的体会。刘咸炘将二者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并付诸实践,收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sup>[15]</sup>的效果。

(2)韩愈诗文的定目。刘咸炘对韩愈诗文评议,最有特色的部分就是《韩文定目》。《韩文定目》将韩愈诗文定为上中下三品,且指出分类标准:上品“与古抗行,可为后世法”<sup>[1]1437</sup>、中品“工能”<sup>[1]1438</sup>、下品“自作狡狴,不可为法者”<sup>[1]1438</sup>。各品之内,收有不同体裁的相关作品。浏览此目,即可感知韩愈诗文的宏观印象。翻检《推十书》戊辑,

刘咸炘另有《四文定目》一书,分别为《韩文定目》《柳文定目》《近代八家之目》《近代善文目》。由此可见,刘咸炘颇为热衷此道。

中国传统对人进行分等评品的思想起源很早。其后班固在《汉书》中独创《古今人表》,备列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其后,钟嵘《诗品》对此又有吸收,正如郑振铎(1898—1958)所言:“也许是受有《汉书·古今人表》的若干影响吧,故他把五言诗人们分别为上中下三品而讨论之。”<sup>[16]183</sup>而郭绍虞(1893—1984)则明言《诗品》“本班固九品论人之法以衡诗,分为上中下三等”<sup>[17]104</sup>。随着魏晋时期人物品鉴的兴盛,其后逐渐波及艺术的层面,如诗文字画等的品评,且蔚为大观。

刘咸炘《韩文定目》是在对韩愈诗文物鉴的基础上形成的。有了对作品的品鉴,其艺术成就的高下之分也就一目了然。可以说,定目是品鉴的自然结果,二者的关系就如同瓜熟自然蒂落,水到自然渠成一般。只是历来的论文者对韩文的赏鉴只是停留在单篇字句,而未顾及全书。从这个意义来讲,刘咸炘的《韩文定目》是一个创新,且有独特的价值。

《韩文定目》有两个版本。一个收在《订韩》中,一个收在《四文定目》中。因《四文定目》撰写时间不详,今无从确定二书成书先后。对比二者,略有差别。《订韩》中每品均有“五言古诗”一体,《四文定目》中全无;《四文定目》下品中有“联句诗”一体,但并未罗列相关作品,而《订韩》中无此一类。此外,尚有诗文顺序、题名等不同。

《韩文定目》是刘咸炘对韩愈诗文评价的一种直观呈现。我们可以结合刘咸炘对上中下三品划分所提出的标准,以及他对韩愈部分诗文的具体品鉴,来进一步考察韩愈诗文。比如,韩愈《送孟东野序》一文,入选韩愈诗文选本的频率甚高,且历来饱受赞誉。刘咸炘认为该文“波澜壮阔,便于初学摹效”<sup>[1]1430</sup>然而,刘咸炘在《韩文定目》中将其归为“下品”。推求其原因,只能从“自作狡狴,不可为法者”入手。

#### 四、小结

韩愈作为诗文名家,开一派风气,向为论文者所关注。因此,关于其人其文的相关研究成果极为

丰富。即以民国时期而论,有关韩愈的研究就很多。较著名的如陈登原《韩愈评》、钱基博《韩愈志》《韩愈文读》、陈柱《正韩篇》《礼韩》、范幼夫《韩文毛病举隅》等。这些书籍,坊间大多可以寻访。对于韩愈其人其文,历来持论纷纭,毁誉不一,难免意气用事,流于极端。即使是苏轼一人,对韩愈的评价也前后不一。既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又讥其“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sup>[18]</sup><sup>114</sup>。评价人物之难,由此可见一斑。而刘咸忻对韩愈其人其文的评析,往往毁誉交杂,并非一味驳斥,或一味赞扬。意气平和,持论公允,乃其最大特色。总之,“明韩氏之功罪”<sup>[19]</sup><sup>15</sup>乃其用心之所在。本文就此条举数则,至于其学术价值有待学界进一步研讨。

#### [参考文献]

- [1] 刘咸忻.订韩//推十书:丙辑[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 [2] 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 张惠民.1911—1948年间韩愈研究综述//韩愈研究资料汇编[C].汕头:汕头大学中文系,1986.
- [4] 韩愈.屈守元,常思春,校注.韩愈全集校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 [5]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3册[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
- [6]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1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 [8]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9] 钱穆.读史随劄[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 [10] 辛文房.唐才子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 [11] 袁枚.与翁东如//小仓山房尺牘[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 [12]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9.
- [13] 刘昫.旧唐书:第1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4] 张籍.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5] 章学诚.王重民通解.校讎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 [16]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 [17]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 [18]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9] 钱基博.韩愈志[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朱德东)

## Review of LiuXianxin's Study on HanYu

CHEN Kai-lin, WEI M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HanYu, as a famous poet and literateur, has always drawn many researchers' attention. Liu Xianxin's DingHan makes comment on HanYu and his books, which has many fantastic views. As the book hasn't been published so far, few people know the book. With the publishment of Tuishishu, its academic value is worth further discuss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ook DingHan on the writing reason and the style, and concludes HanYu's behavior judgment and Hanyu's peotry prose with the specific review of Liu Xianxin. Behavior judgment is shown in three aspects: advocating Confucianism and rejecting Buddhism with speciosity; begging the powerful and damaging Confucianism; commenting unjustly and recording untruthfully. On Hanyu's peotry and prose, Dinghan contains appreci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LiuXianxin; DingHan; HanYu; TuiShiShu